

编者按:9月15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强调“对应该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松开手、放到位，做到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决定”。这是首次提出市场准入全面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将引发我国对内外资管理体系和思路的重大变革。这也意味着市场准入将全面开启“负面清单时代”。

“负面清单”概念最早是在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引入。它是指一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同年9月启动的上海自贸区正式引入针对外资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此后，“负面清单”成为高频词见诸报端，国内各级地方政府也热衷于负面清单的尝试与实践，推出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负面清单”等各类清单，其范围已从外资管理延伸到内资管理，而其管理理念则进一步渗透到所有市场管理中，引发政府职能和管理思路的大转变。

目前国内各地普遍采用正面清单，没有现行经验可供借鉴，制定负面清单时，深圳龙华新区依据最小保留、公共利益保护和公共秩序维护三个基本原则加以确定。

本期推出“负面清单”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的兴趣。

本期专题·负面清单

- 02 市场准入将全面开启“负面清单时代”
- 03 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出炉 沪粤津闽四大区均适用
- 04 深圳龙华新区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办法
- 05 通辽市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
- 06 负面清单的前世今生

高层动态

- 08 解析“习奥会”焦点议题 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

高层声音

- 10 中央高层敏感时点三天三谈改革重要性 他们说了什么

经济纵横

- 12 中国财政收入主体税种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下滑

人物长廊

- 13 起底证监会落马高官张育军：曾被批有军阀作风

文化点击

- 15 “四大名著”不是由来已久

历史深处

- 18 罗斯福为何要出卖中国主权

悦读时光

- 封三 一个潜伏中国长达37年的日本间谍的自述(三)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市场准入将全面开启“负面清单时代”

9月15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强调“对应该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松开手、放到位，做到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决定”。这是首次提出市场准入全面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将引发我国对内外资管理体系和思路的重大变革。

政府只在市场之手失灵时才进行监管

我国最早是在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中引入“负面清单”概念，是指一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同年9月启动的上海自贸区正式引入针对外资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此后，“负面清单”成为高频词见诸报端，国内各级地方政府也热衷于负面清单的尝试与实践，推出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负面清单”等各类清单，其范围已从外资管理延伸到内资管理，而其管理理念则进一步渗透到所有市场管理中，引发政府职能和管理思路的大转变。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首先要求投资管理的思路转变。会议指出，要“把激发市场活力同加强市场监管统筹起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从投资指导目录的“正面清单”到特别管理措施的“负面清单”，意味着市场准入将大大放宽，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将由市场主体依法决定，政府则将从市场管理者转向市场服务者的角色，只在市场之手失灵时才进行监管。

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还要求投资管理的方式转变，从逐项审批到特别管理。

负面清单范围从外资扩大到所有投资

引入负面清单还要求进行外资管理的法律法规改革。商务部今年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引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规定了国民待遇的例外措施，这是外资领域引入的首份全国性负面清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孟雁北认为，这个“负面清单”目录可与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未来可能实施的“负面清单”相对应，为后二者提供立法支持。

而且，此次通过的《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还首次将负面清单的范围从外资扩大到包括内资在内的所有投资，这意味着项目审批制度将全面改革，需要与相关审批部门的简政放权同时进行。

负面清单管理要先行先试。会议指出，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完善。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在上海自贸区试点后，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大到天津、福建和广东等新建自贸区，并将进一步完善。

今年4月公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特别管理措施从2013年版的190项进一步缩小至122项。投资管理模式的创新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从当月新自贸区启动至7月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通过备案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共754家，合同外资421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区内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及合同外资的比例分别为80%和57.5%。（新华社）

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出炉

沪粤津闽四大区均适用



资料图：3月26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管理委员会已准备就绪，等待揭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王东明 摄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列明了不符合国民待遇等原则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统称自贸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划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其中特别管理措施包括具体行业措施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水平措施。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文化、金融审慎、政府采购、

补贴、特殊手续和税收相关的特别管理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自贸试验区内的外商投资涉及国家安全的，须按照《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进行安全审查。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在自贸试验区内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并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指南，做好相关引导工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在自贸试验区内投资参照《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执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我国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并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有更优惠的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协议或协定的规定执行。



深圳龙华新区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 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办法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王敏 郑向鹏 通讯员 肖亚西）记者昨天从龙华新区了解到，该区率先推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此举不仅有利于破解龙华新区大部制下人少事多的难题，也为深圳市简政放权再探新路。

据介绍，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社区服务、公共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其他政府职能很少涉及。从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完善深圳市龙华新区大部制治理结构角度出发，龙华新区大胆突破，将社会组织可承接的职能范围从狭义的公共服务拓展到全区政府职能。

“目前国内各地普遍采用正面清单，没有现行经验可供借鉴，制定负面清单时，龙华新区依据最小保留、公共利益保护和公共秩序维护三个基本原则加以确定。”主要负责起草办法的龙华新区社会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从《深圳市龙华新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负面清单管理办法》看到，负面清单共包含政府职能事项 114 项，主要涉及政府职能性质中的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 10 类。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开放精神，凡是清单上未列明的事项，都可列入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范围。

此外，为配合负面清单的实施，龙华新区社会建设局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更好地发挥负面清单的功能，释放社会组织的潜力。

而此前，龙华新区通过“宽进严管强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新模式改革，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提供了基础。据了解，社会组织数量从 2011 年 12 月底新区成立之初的 244 家，增加到 2015 年 8 月初的 510 家。目前，新区已有上百家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资质。

“龙华新区率先推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是政府职能转移改革的超前设计，弥补了正面清单难以全面覆盖政府可转移工作事项的缺点，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这将有利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对项目调研后给予高度评价。

通辽市建立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杜梓带头制定了市委书记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并要求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党组书记和市政府各副市长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清单,以上率下,推动“责任清单”制度的全面实行。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

明确党委“责任田”

清单设计按照务实可行的思路,根据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的不同职责重点,分别制定了党组(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清单和党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责任清单,确定了党组书记的10项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5项主体责任,明确了该干什么,增强落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党组(党委)书记责任清单明确了党组书记在组织领导、严格用权、选任干部、作风建设、发挥表率作用等10个方面的责任内容,并力求将工作要求量化,规定年内涉及“四个亲自”问题办理次数不少于12次,讲授廉政党课不少于1次,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等。领导班子成员责任清单从履行“一岗双责”、知纪明纪、加强日常监管、推进预防腐败等方面对班子成员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年内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检查报告不少于5次,督促检查不少于2次,力求各项责任要求具体化、工作开展常态化。

建立主体责任负面清单

厘清权力“边界线”

坚持问题导向,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主体责任清单主要内容,找准对应违反规定要求和严令禁止的行为,在主体责任负面清单中确定了政策执行、领导责任、督促落实、推进“三转”、选人用人、权力监管等10个方面易出现的25个问题,明确限定了履行主体责任“不可为”的内容,如禁止出现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三转”不到位、“三重一大”制度落实不力、违纪问题监管问责不力、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疏于管理,私设“小金库”等问题。通过对负面清单内容的细化和问题的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履行主体责任哪些行为不可为,为履行主体责任的考责问责提供了量化依据。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

聚焦纪委“主阵地”

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全面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明确区分党委责任与纪委责任,对市纪委监督责任工作方案的任务进一步细化,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将协助党委履职、执行纪律监督、深化作风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严格纪律审查、强化廉政教育、严格责任追究、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派驻机构领导等10个方面工作明确为纪检监察的主业,真正让纪委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检查上。同时,为了把纪委的监督责任落实的更加具体,清单细化提出了加强对干部履职情况的监督、“一把手”末位表态、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要求建立实行监督责任(下转第11页)



负面清单的前世今生

负面清单,又称“否定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的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即投资领域的“黑名单”,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明确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外,其余所有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作为国际投资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上已有 70 多个国家采取采用了这一外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起源

负面清单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1834 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同盟国就是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订立贸易条约。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公用事业、造船等行业的列举可以看作国民待遇义务的“负面清单”。

在负面清单方式上取得了试验和突破的是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其创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规则模式。在 NAFTA 的示范效应下,美国成为了负面清单模式的最大推动者,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第三代国际投资规范正在重塑世界投资和贸易格局。

国外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2]

(一)欧盟

欧盟国家商签投保协定历史早、数量多、影响大,28 个成员国共对外签署了近 1200 个投资保护协定,约占全球现存有效投资保护协定的半壁江山。伴随国际形势变化与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近年来“欧式”投资保护协定逐步显现出“美式”投资保护协定特征,即由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2009 年之前,这些协定基本未涉及投资准入与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因此多采用正面清单模式。如欧韩自由贸易协定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截然不同,欧韩自由贸易协定采用“正面清单”,而非“负面

清单”模式。根据欧盟统计资料显示,在所有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欧韩自南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涉及面最为宽广,几乎涵盖美韩自南贸易协定涉及到的所有领域,韩国给予欧盟服务提供者近乎于美同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市场准入待遇。

2009 年《里斯本条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其生效意味着欧盟取得对外缔结国际投资协定的专属权。此后,欧盟致力于推进对外商签涵盖投资保护和投资准入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进程。2012 年 4 月,欧盟与美国联合发表关于国际投资的“七条原则”,强调各国政府要给予外国投资者充分的市场准入及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这标志着欧盟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一步,准入前国民待遇将成为欧盟签署国际投资协定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2013 年 10 月,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在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中已有所体现,并且“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有望成为加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推手。由此可见,欧盟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步实现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跨越。

(二)美国

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早使用了列表形式的负面清单。自 2004 年以后,美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投资章节中,均含有负面清单。从缔约方看,既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韩国),还有发展中国家(智利、秘鲁、蒙古、刚果、孟加拉等)和最不发达国家(卢旺达)。从内容上看,2005 年之后美国签订条约在负面清单行业列表内容上大同小异。由此,负面清单可复制,可推广的特点可见一斑。其中,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于 2007 年 6 月 30 日签署,2012 年 3 月 15 日正式生效,采用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由于负面清单仅

列出不实行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行业类型,因此对于协定生效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业而言,负面清单无异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承诺表。美国试图通过负面清单模式促使韩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市场进一步扩大。美国与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于2012年签署,负面清单行业列表涉及通讯、运输、有线电视、社会服务与少数民族群相关的产业等。渔业、航空、海事、电信不适用于最惠国待遇。此外有关金融服务业的13条不符措施单独列出。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BIT范本(2012年版)在强调公众参与和透明度的同时,对劳工与环境保护予以强化。

(三)日本

日本在近年来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协定中也广泛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如2002年3月22日签署,2003年正式生效的《日本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日本与越南,日本与秘鲁双边投资协定均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日本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通常结合自身特点(如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等),确定对采取与补贴有关措施的保留,对外国人参与国有资产处置权的保留,基于互惠基础处理外资与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有关事项的保留、采取与维护、指定和取消公共垄断相关措施权利的保留。

具体来看,《日本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中负面清单行业列表涉及:与农业、林业和渔业相关的第一产业,石油工业、矿业、供水和供水系统行业、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电信行业等。这与《日本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中负面条款内容基本一致。

欧美日国家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的共同之处有:倾向于以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推动区域经贸谈判进程,负面清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应用和推广;对外签署投资协定时均充分考虑自身特点,注重结合本国国情,对敏感行业如航空、电信、运输等行业予以保留。不同之处一是欧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起步较晚,现有投资协定多采用正面清单模式。而美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沿用时间较长,经验相对丰富。二是就美日而言,负面清单行业列表内容也

不尽相同。在负面清单中,日本与农业、林业和渔业相关的第一产业内容涉及面较广,而美国主要对渔业有所保留,个别州政府对与土地有关的农业投资加以限制。

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区别

因为负面清单是除了这些都可以投,而正面清单是指只可以投这些。负面清单上会很清楚地说明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有什么限制。这一模式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公开透明,对于增强外资信心,鼓励、吸引外商投资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制定主要由上海市完成,制定过程中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了大量梳理,分类方法参照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定了190条管理措施,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内投资按原有办法管理,清单外的投资按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推行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实行动态管理模式,以后可能会随着改革的发展进行调整。

按照规定,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后,对清单以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将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将改为备案管理。如此一来,原本一般投资项目承诺29天办理完结,新规则下企业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最快只需4天,企业办事效率将大大提升。^[3]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出,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监管重心和监管体系的变化,政府职能将从注重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这需要形成综合监管体系。对这样一个综合监管体系,要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企业在试验区内运作,与之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汇集、共享。二是要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三要建立综合执法体系,改变原来部门相对分割的执法格局,形成一个综合执法的格局。四是要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五是要建立综合评估机制。六是在风险防范上要建立反垄断和安全审查机制。

解析“习奥会”焦点议题

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



特派记者 陆振华 华盛顿报道
奥会焦点议题。

先后以白宫亚洲事务主任和特别顾问的身份，服务过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2002至2006年，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随后进入商界，在2006至2008年成为摩根大通国际（JPMorgan Chase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

作为美国极富声望的台湾问题专家，包道格的评论都会被台湾媒体置于放大镜下；他也因此在2012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卷入过激烈的舆论纷争。

台湾问题上，包道格说，现在因为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台海关系）可能受到一点挑战。所以中美需要保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密磋商。“紧密磋商曾经保证了我们不走向危险的境地。”

包道格认为，在诸如网络安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分歧领域，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主要大国间的冲突将毁掉21世纪，所

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Paal）拥有丰富的跨越政商两界的履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包道格在其位于卡内基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拆解习

以我们必须排除这个选项。”

他表示，希望中美领导人“向欧盟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出信号，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各自的内部改革”，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美国大选也将在中短期影响中美关系。包道格透露，两国元首的会面将引入一定的稳定因素，以保证双方不至于因为选举政治而离得太远。“我也听到，中方想借此访问的机会，压好舱石。”

敏感点：网络安全、南海与台湾

《21世纪》：在习近平访美前，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最棘手的敏感问题。双方高级官员的互访，也在这个问题上着墨颇多，努力使其在临近访问日期前缓和下来。现在看有没有解决方案？

包道格：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领域，中美对网络、国际知识产权、情报收集等有着非常不同的取向，最终也包括将网络作为一种武器。所有这些议题都既需要分开，也需要集中来处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美国应该提出倡议，要界定哪些议题是可以合作的，哪些是红线。双方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不能等到积怨愈深之时。

在网络问题上，上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磋商质量并不高。不过上周，中方向美发出了积极信号，向美派出了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带领的代表团。这是好兆头。因为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确实有共同的目标，比如打击网络涉黄、网络盗窃和欺诈，这在两国都是犯罪行为。

《21世纪》：围绕南海是另一个中美之间的外交敏感点。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前还经历了一段稍

显紧张的时期,现在呈现降温的趋势?

包道格:中方降温,美方也降调,为这次国事访问创造了更好的气氛。南海问题证明了中国新的海洋能力,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全覆盖的途径:是相互竞争,还是作为一个新的海洋大国来对待。要做出选择的不仅是美国,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以及其他国家在内。领导人们应该采取一个更加战略性的眼光。

《21世纪》:关于中美两国在亚太事务上的讨论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吗?

包道格:在历史上有过主要大国既要追逐利益,也要掌控分歧的例子。当主要大国不这样做的时候,历史也有非常可怕的后果。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主要大国间的冲突将毁掉21世纪。所以我们必须排除这个选项。

在亚太,我们需要同时将这些结合起来考虑: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国,现存的主要国家日本和韩国等,以及美国。

《21世纪》:在亚太,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您在台湾问题上享有盛誉和声望的专家。最近华盛顿另一位知名台湾问题专家,因为在这个事项上的发言而卷入舆论纷争;可见美国及美国前官员、专家在台湾上的敏感性是无以复加的。你预期两国领导人会在华盛顿如何就台湾展开对话?

包道格:我认为两国领导人需要考虑到,台海关系拥有了8年的和平与发展期。现在因为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台海关系)可能受到一点挑战。所以中美需要保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密磋商。紧密磋商曾经保证了我们不走向危险的境地,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就更加深入的紧密磋商达成共识。

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

《21世纪》:因为中国近期介入股市和汇率政策的调整,中美之间也就经济政策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随之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美均需阐明增长策略。两国领导人如何在经济政策上做好协调?

包道格:另外一件我希望两位领导人做的,就是向欧盟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出信号,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各自的内部改革,来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点的作用。

8月份,我们看到了上海股市的波动和人民币的调整,虽然外界很多观察不成立,但是现实是,市场的神经已经紧张了。那么中国就需要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美国需要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做出平衡。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紧密的(经济政策的)磋商沟通。数年前,金融危机之时,中美在保尔森和王岐山、在盖特纳和汪洋之间有过很好的磋商沟通。

《21世纪》:两国除了分歧,也确实有诸多合作。比如在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变化。两国也在谈双边投资协定(BIT),但是显然负面清单的谈判仍将耗时长久。你预期BIT会在这次华盛顿会面中取得怎样的进展?

包道格:中方提出了改善版本的负面清单,至今负面清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美投资以及美国在华投资之间,是有非常大的质的区别的。

我预期,中美BIT会有一些进展,中国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一些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不过,最近的国企改革方案显示,能源、银行和交通行业还是不会开放;但在美国,这些行业是向中国开放的。

《21世纪》:奥巴马总统将在2017年1月任期结束,美国也已经开始进入大选期,明年11月会产生新的总统。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包道格:我们前面有17到18个月的选举期。民主党候选人已经对中国展开了批评,每一个共和党候选人会更多的批评中国,所以(选举)会在政治层面上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

我认为这次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会引入一些(对未来大选期间)起到稳定作用的因素,可以保证双方不至于因为大选而离得太远。然后会接着6到9个月过渡到新政府。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也听到,中方想借此访问的机会,压好舱石。

(陆振华)



中央高层敏感时点三天三谈改革重要性 他们说了什么

习近平访美前，中央高层不断释放改革的信号。15-17日，连续三天，习近平、李克强以及发改委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表示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小报告专栏作家刘杉分析称，中国近来一再强调改革，但改革进展缓慢，民间对改革议论颇多，这一方面说明改革不易，另一方面也表明改革需要推动力。习近平此时强调改革与开放，意味着中国想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周期，以外力来打破内部利益均衡，从而达到改革的目的。

高层改革声不断

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组会议并讲话，习近平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

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会议指出，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衔接起来，同国内改革发展衔接起来。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6日，李克强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政策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推向纵深。评估结果显示了这些改革发展举措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结构优化、激发企业活力等正在发挥积极效应，同时也揭示了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要求加强统筹规划，以投融资、贸易便利化等改革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产业转移承接，打造新的增长点。此外，李克强还表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双创”相结合。

17日，习近平会见出席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时表示，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习近平强调，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责任加强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引领，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增强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我们要积极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美国工商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希望你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部委、文件落实

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委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 16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工作高度重视，发改委作为落实改革的部门，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改革范围涵盖：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持续加大价格改革力度；着力推进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改革；积极推进三大战略和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打造“双创”新引擎。

连维良表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推进中还将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把改革推向前进。

17 日晚间，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意见共 11 个章节、50 条具体要求。指出我国改革开放正站在新的起点上，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要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2015 年 09 月 18 日 凤凰财经）

（上接第 5 页）“签字背书”，社会评议、“两个责任”双报告，领导干部述责述廉评议等工作保障措施，着力在标本兼治上见成效。通过建立责任清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抓什么、谁来抓、怎么抓，使责任具体化、可操作。

建立监督责任负面清单

划定履职“警戒线”

按照党章和相关党内法规的规定，对照监督责任清单的主要内容，梳理出违反规定要求和严令禁止的行为，坚持“能量化的量化，不能量化的具体化”，制定监督责任负面清单，从协助党委工作、纪律执行、纪律审查、强化作风监督、推进反腐败协调机制、追责问责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在履行监督责任中严禁发生的相关问题。如不允许出现本地区、本部门“四风”问题频发问题；严禁出现对报

告、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制度落实不力，不能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问题；不准参加与纪委监督责任无关的会议、检查、评比以及已退出的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等，切实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不能做的事情，为履职划定了警戒线。

目前，市直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以市委的清单为样本，根据岗位职责，分别制定了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部门班子成员的清单由部门“一把手”把关，“一把手”的责任清单由分管市领导审核把关，确保了清单的可操作性。各地区也全面梳理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分别制定了本级责任清单，形成环环相扣、层层衔接的履责体系，构建起我市党风廉政建设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网络。

（通辽日报）



中国财政收入主体税种现 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下滑

中国财政收支的矛盾正愈演愈烈。预算收入方面,主体税种如增值税增速已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也在扩大,映射了实体经济的疲弱和价格的持续下行;预算支出方面,已经连续第二个月增速超过 20%。经济下行周期中,毫无疑问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但在截至目前 5.2%的预算收入增速(全年目标 7.3%)和 14.8%的预算支出增速(全年目标 10.6%)背景下,财政收支的矛盾已愈益突出。在既定预算之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地方债务的置换、存量资金的盘活、杠杆比例的提升等方式来实现。

主体税种遭遇次贷危机以来最严重下滑。8 月单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6.2%,扣除 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可比口径同比仅增长 3.5%。财政收入增速在 5、6 月两月有小幅回升,至两位数增速,但 8 月又掉头向下。作为一般预算收入主体的税收收入冲高回落,从 7 月的同比 10.4%回落至 8 月的 3.5%。分具体税种看:1) 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同比增长-4.7%,扣除营改增影响后同比下降 4.3%,创次贷危机以来的新低,折射出实体经济的疲软;营业税实现了 15.2%的增长,其中金融业的贡献不可磨灭;金融业所得税同比增长 14.2%,但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 7.4%,房地产企业所得税亦下降 14.2%。2) 和房地产相关税种有所改善,契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已经转正,这主要受到前期房地产销售持续回暖的带动。除了一般性公共预算外,政府性基金收入依然不容乐观。和一般预算收入不同的是,年初以来,以土地出让为主体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中,1-8 月土地出让金累计同比-38.4%,较前

值进一步下滑。从收入端的角度看,不管是一般预算收入还是政府性基金收入,都是实体经济疲软的真实写照。

财政支出同比连续两月超过 20%。8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5.9%,已经连续两月维持在 20%以上,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程度在加大。特别是,8 月财政政策的积极更多地是中央财政的积极。可比口径下,8 月中央本级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30.2%,而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只有 23.1%。在具体支出领域上,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保持较快速度增长,1-8 月增速分别为 22.7%、21.8%、21.7%和 19.5%。

当下的财政收支困局如何破?我们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发力。但在愈演愈烈的财政收支矛盾下,财政政策拿什么来积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货币政策边际效应减弱,经济托底和结构调整均需财政政策的发力配合。但从目前数据看,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价格低迷、实体萎靡制约着财政收入,截至 8 月一般预算收入同比累计增长 5.2%,离 7.3%的年度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而截至 8 月一般预算支出同比累计增长 14.8%,已经大幅超过全年 10.6%的预算目标,目前单月 20%的支出增长恐怕难以持续。从财政支出节奏看,进度已经快于往年,1-8 月支出已完成预算的 60%,进度比去年加快 1.4 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央本级支出进度更是比去年同期加快了 4 个百分点。因此,在既定预算之下,年内积极财政空间较为有限。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地方债务的置换、存量资金的盘活、杠杆比例的提升等方式来实现。(华创宏观。作者钟正生,余芽芳)



起底证监会落马高官张育军：

曾被批有军阀作风

中纪委再打一虎，这次落马的是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有人评价称，“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著作等身，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不过也有人指其作风霸道，开会时“半躺着讲话”。

“学者型官员”还是“霸道军阀”？

9月16日晚，中纪委网站披露，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前8月初还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或将赴央行担任副行长。

9月17日，新京报记者发现证监会官方网站将张育军及其个人介绍从领导信息栏中删除。已到退休年龄刚刚宣布卸任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庄心一名字仍然保留。同时，有关张育军的讲话与活动链接均已无法打开。

此前9月16日，记者查阅中国证监会官网发现，在“证监会领导”一栏，张育军排名第七，他前面是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以及一名纪委书记，后面还有另外两名主席助理。因此，他也被称为“第一主席助理”，备受器重。

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据悉，证监会主席助理与别的“部长助理”属于正厅级的中管干部，排名在副部长之后，高于部门的厅局长，是“准副部级”领导。

据统计，张育军是证监会有史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的现任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一行三会”系统被查的最高级别领导干部。

张育军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官员”，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和人大法学博士学位，曾出版多本学术著作，得到业内好评。有人评价这位“双料博士”是深耕细作的典型内行+专家。

“双料博士”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成为证监系统史上第一位执掌过沪深两大交易所帅印的官员。他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在任上推出中小板并筹建起创业板，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对证券业的各个业务条线，张育军都很熟悉。

有人如此评价，“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或许正是令人认可的专业能力，才让他像位职业经理人，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

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好学”。曾有深交所员工告诉媒体：“周末到单位加班，好几次看到张总在办公室学习英语。”

不过，也有报道称，张育军在深交所时，有同事称其“霸道贪婪，军阀作风，迟早出事”。此外还有媒体称他“排场大”，有一次跟券商开会的时候都是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他还在与基金经理开会时表示，“未来的犯罪分子就坐在这房中间。”

张育军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一语成谶。

与中信程博明是同门师兄弟

1963年出生的张育军，于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并于1985年至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俗称“五道口金融学院”），师从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正是五道口的这段学习时光,让他与日前被调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程博明于1984年获得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就读于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1987年获得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由此可以看出,出生于1962年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正是张育军的同门师兄。

就在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力、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汪锦岭等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在本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也是此次救市“国家队”的主力。

因此,有分析认为程博明与张育军前后脚被调查,此事值得关注。

巧合的是,此前张育军与程博明均接受过同一个记者的专访。7月16日,程博明接受《财经》记者王晓璐采访。王晓璐称,作为冲在救市前线的证券高管,程博明始终态度坚定地支持采取救市行动。

8月30日,记者王晓璐因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和中信数名高管一起被调查。

与此同时,证监会发行处的一个处长刘书帆也被带走调查。此前2014年12月,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被查。

“救市”时剑指两融配资

在本轮救市期间,张育军露面非常频繁,这与他分管的部门有关系。

现年52岁的张育军,于2012年9月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负责分管包括机构部、基金部在内的“大机构”,主管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不过,2014年4月机构部与基金部合并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简称“机构部”)。

张育军负责的“机构部”是业务创新最多的领域,其中就包括融资融券(下称“两融”)、配资。在两融业务最兴盛的时候,余额曾高达2.7万亿元。此外,还有约1.4万亿元的配资,巨量的高杠杆资金,在当时推动了股市的暴涨。

作为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曾不断督促券商关注创新业务,推动基金业务创新,多次召集券商高管学习互联网企业。张育军被外界冠以“创新型官员”称号。

此后在A股巨幅震荡的救市行动中,张育军频频露面,被称为“救市队长”。据业内人士表示,张育军集合券商、基金、期货等机构召开座谈会,多次提示风险,并强调两融风险以及严禁券商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业务。

2015年4月16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张育军出席会议,并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

5月22日,张育军在调研证券公司时再次要求机构警惕两融风险。

配资业务也成为张育军注意的对象。6月12日和13日,证监会连续两日发声,禁止券商为场外配资活动提供便利。6月15日一开盘,沪指便大幅低开,开启了本轮暴跌行情的序幕。因此,沪指也从5178点高位的“急刹车”,引发了一连串的资金恐慌性出逃,股指雪崩式坠崖。

面对如此“意外”的局面,7月8日,张育军召集多家券商负责人开会,对维护市场稳定提出五点意见。此后,从第三方信息接入、反思程序化交易、清理两融业务等7个方面提出了反思意见。

据媒体披露,上海某家大型券商由于救市不力,在一次会上被张育军当众点名批评。

“总要有人为市场大跌负责”,一位证监系统人员对此表示。

曾指“金融史是诈骗史”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张育军发表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言论。201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的“互联网+资本市场”培训研讨会上,张育军表示,人类金融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诈骗史。

张育军强调,互联网+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严



“四大名著”不是由来已久

1949年之前,没有“四大名著”之说

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而已。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个总称的习惯。比如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所谓“宇宙四大奇书”,冯梦龙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到了清朝,金圣叹评“天下六大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研究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则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这几种说法中,没有一个同时列出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

简言之,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一说法。



金圣叹所评“第五才子书”《水浒》

1949-1966年,四本书印数很大,但仍没有“四大名著”的说法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由冯雪峰任

守监管系统制定的合法合规底线,尊重金融客观规律,才可能健康长远发展。尤其不能一开始就走偏了。要守住6条底线,其中包括:不得非法集资、不得非法吸收存款、不搞资金池、不得非法保本保收益、不搞利益输送、不搞内幕交易。

让张育军得到业内一致肯定的,是他在2014年撰写的《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大有可为。政府可以建立预警防范机制(指数熔断机制),做好应对危机的政策储备(降准、降低交易费、持股一年股息红利免税等),引导市场预期,缓解社会恐慌(证监会发言维稳、国家队救市)。

同时,他指出政府应果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切

断危机的关联及传染渠道,减弱危机强度(暂停IPO、严管股指期货);通过临时监管干预以及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拖延或转移危机,以争取时间和空间。

对比6月以来央行、证监会等部门采取的救市措施,与张育军在一年前所著的这本书里都有提及,几乎一一对应。

张育军在《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中还指出,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

张育军被查,也许是此次股市危机带来的一次变革机遇。

(新京报记者 金彧)

社长、总编辑。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项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随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释条目，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水浒（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国演义》（1953年11月）、《红楼梦》（1953年12月）、《西游记》（1954年6月）相继问世。^①

在《水浒》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中学、报馆、图书馆、研究所,甚至一些演剧队都纷纷邀请该书责任编辑聂绀弩去做报告,北京旧书摊上早曾廉价抛售的古旧小说,价钱顿时提高了,人们普遍议论,‘看来共产党还是需要过去的文化的’。仅仅《水浒传》一书的出版,就改变了社会上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糊涂观念……”^②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短评,名为《庆祝〈水浒〉的重新出版》。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及早就最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绍出来,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版。《金瓶梅》被冷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如其所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③

依照相关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④由此可见,这几部古典小说的出版,在当时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5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并无“四大名著”之称

“文革”期间,这四本书被特许出版,渐有“四大著作”之称

至“文革”爆发,图书出版被严重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典小说也在封存和不允许发之列。^⑤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⑥在这里,周恩来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⑦沈从文将这几本书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不久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要求各地书店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然而,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3800多部,不敷使用。于是中央通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个城市各发20—50部,并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⑧

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周恩来指示:“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样办,那样办是错误的。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已摆出来,卖光算了。”这几部小说随即重印,至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印了20万部公开发行;到年底,这四部书共计印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又加印50万部,依旧供不应求

求。1972年以来，内地还从海外进口了大量古旧书籍。以“四大著作”为例，仅1973年春节后半个月就邮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邮寄11190部。^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要求，对《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5日凌晨，国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浒传》。^⑩由于“书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几乎成了人们的必读书。在“1978—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排在第五名。



尼克松访华，游览长城

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才流传开来。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义出版这几本小说，则是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较早的有《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

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更是汗牛充栋了。

简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是1949年后，伴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几部书的大范围传播，才逐渐出现并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说，这几本书被称为“四大名著”，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的读者最多，而约定俗成罢了。



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注释：

-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1951-20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②陈早春：《略论冯雪峰的编辑出版工作》，见于宋应离等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辑第5辑》，第475页；③《毛泽东谈〈红楼梦〉》，见于童庆炳等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9页；④⑤易图强：《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博士论文；⑥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记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⑦《沈从文复史树清》（1971年6月9日），《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5页；⑧⑨⑩方厚枢：《古典小说名著出版史话》，《中国出版史话新编》，第152、153页。

（腾讯短史录2015-09-07第393期）



罗斯福为何要出卖中国主权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二十八期《雅尔塔密约》。

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斯福将大连、中东铁路等出卖给苏联

在1945年2月4日——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主要讨论处置德国、波兰划界等欧洲问题,涉及中国的议程,丘吉尔并无兴趣,几乎全由罗斯福、斯大林商定。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苏联出兵东北的条件。

苏联所提对日作战的条件,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43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美国国务卿赫尔说,苏联对日作战“完全不需要你们要求”“也没有附带条件”。在一个月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提出希望战后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1944年10月,在德国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对来访的丘吉尔说,美国除了增加援苏物资外,还要“阐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方面”。^①到了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终于摊牌,声称要“收回日俄战争时日本从我国夺取的东西”。

在会谈中,斯大林首先要求日本在战后归还库

页岛南部与千岛群岛,罗斯福表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紧接着,斯大林说到远东不冻港(指大连)问题,罗斯福说“他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因此,他不能代中国人讲话。”但他又说,“俄国要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由两个办法:(1)干脆向中国人租借;(2)使大连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自由港”,而“他赞同后一种办法”。这意味着,罗斯福代替中国选择了一个战后管理大连的方案。

随后,斯大林要求在战后继续使用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罗斯福说,“虽然他还没有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个问题,但是又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2)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日俄战争后,沙俄被迫将南满铁路让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又将与中国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路权售于伪满洲国,此时苏联要求在战后恢复使用两条铁路,竟获美国同意。通过雅尔塔密约,后一方案成为现实。

斯大林还向罗斯福解释了提出以上条件的原由,“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对德作战是由于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要

同一个同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但是，“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对于这些条件，罗斯福并不反对，他说自己“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会谈，同时，他觉得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二十四小时内全世界就都会知道。”言下之意，以上侵害中国主权的约定，无需在此时通知中国。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而且他可以担保最高苏维埃会保密的。”他希望，“能由三大国书面写下同意提出的这些条件。”罗斯福当即表示，“这可以办到。”②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最后签订的雅尔塔密约中，还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虽然在美国要求下，密约中被加上“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但随后又写明“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且“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很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同意权变得微不足道。

至于对中国保密的理由，一方面是出于军事原因，防止日本获得情报后先发制人，对苏联兵力薄弱的远东地区发动攻势。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原因，一旦苏联出兵的条件为中国所知，蒋介石一定会极力反对，使密约无法落实。



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一起

美国希望通过雅尔塔密约，减少自身伤亡，并限制苏联在中国扩张

美国之所以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也要换取苏联出兵东北，有着其极为现实的考量。当时美国确信，即使苏联不出兵，也同样能击败日本，但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美军估计，“结束对日作战的计划日期应确定在击败德国18个月之后”，伤亡50—100万人。而原子弹当时尚未全部研制成功。

对日军有着充分了解的麦克阿瑟说，“中国人所能给予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获得俄国人的许诺，使他们在满洲国对日军进行积极勇猛的战斗，达到能牵制大量日军的程度”，而美军主力应当“用于日本本土”。③一旦苏联参战，除了承担消灭关东军的责任外，还能通过西伯利亚东部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并切断日本与亚洲大陆的联系。这样一来，很可能美军不必发动登陆作战，即能迫使日本投降。

减少美军伤亡固然重要，但这也仅是罗斯福促使苏联出兵的原因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在远东满足苏联，有助于罗斯福构筑他所规划的世界格局。如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所言，“他拼命想使斯大林在他关心的其他方面，即联合国和波兰问题上，更好地合作。他不想把手中的牌打光，并且可能试图节省他的精力……罗斯福一直不太拘泥于行文……我的印象是，只要他能对行文做出自己的解释，他就不太关心别人是怎么解释的了。”④因此，即使斯大林擅自在雅尔塔密约的文本上加上有利于苏联的字句，罗斯福也并未反对。

在罗斯福看来，这个从始至终都向中国隐瞒，且损害中国主权的密约，甚至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全程参与了雅尔塔会议的哈里曼即声称，密约事实上限制了苏联在中国的扩张。其理由是，苏联素来怀有恢复沙俄在东北旧有权益的强烈愿望，无论有无雅尔塔密约，都必然会出兵东北。

苏联如果在没有条约约束的状态下对日作战，那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预计的那样，“俄国在军事上能够击败日本和占领萨哈林（即库页岛）、满洲、朝鲜和华北，在美国军队可能占领这些地方之前。”^⑤二是哈里曼后来在国会作证时说的，“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正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⑥显然，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都会损失更多利益，并妨害美国在远东的地位。

罗斯福还认为，雅尔塔密约的签订，使苏联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许诺战后“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有助于中国民主化。在后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进一步规定，“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由此在名义上停止了对中共的援助。

虽然罗斯福对雅尔塔密约的内容是满意的，但后来并未打算严格落实密约。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即向中方透露了密约的大致内容。在中国压力下，罗斯福有意让密约“缩水”：“（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主权属于中国……委托制度……大约由三方组织之，一为中国代表，一为苏联代表，一为美国代表，均为铁路专家。关于第三点军港问题，伊谓此完全为一新问题，而在前所谈大连问题之外，伊当答复史氏（斯大林），谓此为将来之问题，无须太急，伊可与钧座商之……总统之意，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⑦

不幸的是，一个月后罗斯福突发脑溢血病逝，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不，选择了全面落实雅尔塔密约内容。



苏军攻占哈尔滨

注释：

- ①王贵正：《雅尔塔会议的大国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②《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9-166页；③（美）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④《哈里曼回忆录：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77、478页；⑤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⑥周希奋：《雅尔塔协定和美国的远东战略》，《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⑦《魏道明致蒋介石》，1945年3月12日，《战时外交》（二），第542—543页。转引自张振江《〈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

